

主编
麦永雄

东方文化—东方美学—东方文论—东方文学—比较诗学—比较文学

東方叢刊

2006.2

- 中华美学学会
-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
-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
- 全国高校东方文学研究会
-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联合主办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东方丛刊

季羨林題

Dongfang Congkan

中 华 美 学 学 会
中 国 比 较 文 学 学 会
中 国 中 外 文 艺 理 论 学 会
全 国 高 校 东 方 文 学 研 究 会
广 西 师 范 大 学 文 学 院
广 西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联合主办

2006年第2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丛刊. 2006年. 第2辑 / 麦永雄主编.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5

ISBN 7-5633-6023-9

I. 东… II. 麦… III. 文学研究—中国—丛刊
IV. I20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39381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15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168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89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8.375 字数: 210千字

2006年5月第1版 200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 001~1 000册 定价: 1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主编 / 麦永雄
编辑部主任 / 宋瑞兰
编辑 / 莫道才
/ 廖国伟



通讯地址：桂林市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东方丛刊》编辑部
邮编：541004 电话：0773-5846040
电邮：dfck1992@126.com dfck1992@163.com
网址：<http://courses.gxnu.edu.cn/chinese/gdwx/dfck.html>

-
- 封面题字 启 功
 - 责任编辑 袁永雄
 - 装帧设计 陈 亮
 - 装帧设计 张 明

《东方丛刊》

编委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顾问

季羨林 贺祥麟

特约编委

丁 帆 叶 朗

乐黛云 刘纲纪

刘中树 朱立元

吴元迈 饶芃子

郭齐勇 钱中文

黄海澄 黄宝生

童庆炳 曹顺庆

董晓萍 曾繁仁

编委

王 杰 王德明

孙建元 麦永雄

张明非 张利群

肖启明 何林夏

莫其逊 黄伟林

覃德清 雷 锐

目 录

文学史观与文学史新视野

董乃斌	主持人语	(1)
董乃斌	文学史学:对象、性质及其定位	(5)
宁宗一	心态史研究与文学史建构 ——一个层面的考察	(25)
杜晓勤	诗歌·音乐·音乐文学史 ——先秦两汉诗歌史的音乐文学研究法	(40)
刘怀荣	近百年中国“大文学”研究及其理论反思	(52)
韩经太等	《中国古代文学通论》与文学史编写的创新 ——《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座谈纪要	(72)
宁稼雨	女娲造人(造物)神话的文学移位	(82)
林继中	回味生命的艺术 ——论陶渊明的审美实践	(95)
戴伟华	唐代文化弱势区的诗歌创作	(110)
钱志熙	论《说岳全传》的通俗小说性质及其在文体上的表现	(130)

东方文学与流散写作

孟昭毅	主持人语	(156)
孟昭毅	旅美派作家流散写作的美学意蕴	(160)
梁 工	古埃及末期的犹太流散文学回眸	(170)
黎跃进	东方古代流散文学及其特点	(185)
高文惠	库切——混杂文化身份的承载者	(204)
齐 园	历史寓言与文化象征 ——移民三雄后殖民创作中的“历史”主题	(217)
郝 岚	流亡者的流亡之思——再读萨义德	(226)
吴冰洁	边缘对中心的挑战与融合 ——白先勇短篇小说人物形象之文化解读	(236)

东方文库

温儒敏 李欧梵等	承接古今,会通中西:乐黛云主编《跨文化沟通 个案研究丛书》系列书评	(245)
周人花	《误读俄罗斯》:中国现代性的“万花筒”与 “俄罗斯方块”	(260)

“文学史观与文学史新视野”专栏主持人 董乃斌教授简介

董乃斌,男,1942年生于上海。196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长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该所副所长,兼该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该校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李商隐研究会会长、中国闻一多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古典文学学会副会长等。

著有《李商隐传》(1985)、《李商隐的心灵世界》(1992)、《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1994)、《文化紊流中的文学与文士》(1995),主编与合著有《唐代文学史》(1995)、《彩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95)、《唐帝国的精神文明》(1996)、《中国文学史学史》(2003)等。发表论文《中国诗学渊源论》、《民间叙事论纲》、《民间叙事与古典小说》等。目前的学术专攻:中国古代文学史、文学史学、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等。

主持人语

如果说“文学史”曾经是 20 世纪中国学术的一个热门,也许不难得到学界的认同。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我们的文学史学科已有了多么长足的发展!我们哪一个大学的中文系不给学生开设几门文学史课程?我们的教育部门和文学研究单位又曾花费了多少人力物力用于各种文学史的编写?我们已出版的各类文学史著作,据并不完全的统计,总数已突破两千种,而且直至今日,各种类型的文学史著作,还在大量产生着和酝酿着。用“繁荣”乃至“十分繁荣”来形容我们的文学史事业,应该不会遭到多少反对。然而,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却是:人们对现行的文学史课程和已有的众多“文学史”并不满意,几乎普遍都认为:文学史课程亟需改革,一部真正理想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尚未出现……

于是,反思这一个世纪的文学史教学和研究实践,总结经验教训,探索问题所在和解决问题的途径,便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所谓反思,也就是要对以往的文学史实践及其成果进行全面深入的学理性分析,把问题提高到理论和规律性的高度来认识、思考和研究。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关于文学史的学术反思,已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包括多种专著的出版和大量相关论文的发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中国文学史学史”的实施和完成,也是这一反思的收获之一。而《文学史学原理研究》则是其自然合理的延伸。随着文学史事业的长足发展,“文学史学”作为一门新学科已呼之欲出。本刊刊出“文学史观和文学史新视野”专栏,就是要积极参与到有关文学史实践的反思和文学史理论的建设中去。

是否懂得和善于反思,从反思中省悟成败得失的原因、规律和蕴含其中的哲理,是衡量人的觉悟和智慧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尺。从来就不存在无目的无方向的反思。我们反思以往的文学史研究,是为了推动和拓展文学史研究的未来。文学史学是对文学史实践的理论提升,从实践而来的理论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新的实践的运作上去。无论研究哪一门学术史,归根到底是为了集中人类智慧,使这门学术更健康茁壮地成长。这其实不仅是中国学术界的自觉行为,也是世界同行都在做、甚至早在做的事。因此在我们的反思中,必须也必然要认真借鉴国外同行的经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具有指导意义。西方哲学、历史学的种种新观念和新思潮,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的具体进展,从结构主义的各个学派,到新批评、接受美学、符号学理论、解构主义的阐释学乃至与意识形态关系更为密切的文化研究,等等,都在我们有鉴别的学习和汲取之列。

本栏目在这一辑发表9篇文章,从内容上可大致分为两大块。前4篇属文学史学范畴,理论色彩较强。文学史学是一个正在形成、势头颇旺的新学科,它的对象是形形色色的文学史研究,其历史的纵轴从上古直通到当代,故文学史学理所当然地为所有文学史工作者所关注。董乃斌的文章论述文学史学的对象、性质和它的学科定位,是对文学史学几个最基本问题的阐说,目的在于确立建构文学史学的前提,可以说是有关这门新学科的一篇绪论。其对文学史和文学史学内涵和外延的论述,对文学史学与文学理论关系的辨析,提出了可供研讨的一家之言。宁宗一是一位带着强烈感情来研究文学史的学者,他不满足于对“文学是人学”的一般理解,强调把文学史建构的基础放在作家心态史,特别是心态波动和流变的研究之上。其文章的副标题是“一个层面的考察”,显示文学史的内涵并不止于此。但不能否认,对于文学史的本质和定性,他所论证的是一个相当重要、有持续深入发展可能的层面。刘怀荣的文章抓住近百年来文学观的变迁这个总题,

细致地梳理了“大文学观”在文学史研究中的投影和作用,资料丰富翔实,尤详于近年和当下,立论也颇平实公允,是今后研究这个问题的良好出发点。当然,文学观与文学史观两者,既有深刻联系,又有各自疆界,如果深细追究,尚须各自清理,有许多方面的工作可做。除以上三篇外,还有一组对傅璇琮、蒋寅主编的七卷本《中国古代文学通论》的评论。傅、蒋之书集合众多当代的文学史名家和精英,以囊括古今、独标一帜之势,创写了一种新型的文学史,深获同行赞赏。这组文章虽是评论,但均具有程度不等的理论性,尤其是韩经太的文章,实际上阐发了他对文学史观和文学史编撰的见解,如予以系统展开,不难成为一篇文学史学的宏论。

文学史创新离不开具体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研究。本栏另5篇就是这样的专题研究文章。宁稼雨揭示女娲神话向文学移位的历史过程,并深入探讨这种移位的内在动因。杜晓勤论证先秦两汉诗歌与音乐的深刻联系,认为仅以诗歌研究,必难得肯綮,特提出“音乐文学研究法”,呼吁学者扩大视野和知识面(如音乐史、舞蹈史、艺术发生学、传播学和接受学等)。戴伟华对唐代幕府文学有专攻,此次进而提出“文化弱势区”的概念,论述初唐岭外贬谪诗人和盛唐安西北庭边塞诗人的创作,力图从中提炼出某些带有规律性的观点,与宁稼雨的文章一样,表现出可贵的理论探索意识。钱志熙本以古代诗歌研究见长,著作颇丰。近年扩大领域,涉足小说。这次以《说岳全传》为对象,阐述通俗小说的文体特征,涉及小说形成与传播的种种问题,细致分析与理论抉发相得益彰。

专栏篇幅有限,幸好文章都不太长,所以还能发出不少。这些文章所论究竟孰是孰非,还望读者不吝赐教。

文学史学：对象、性质及其定位

◎ 董乃斌

一

学术界对于创建文学史学的议论，已经有些年头了。对此，我们曾有过不少思考。在“中国文学史学史”的国家课题完成及有关专著出版以后，对于文学史学原理的探索，自然提到了更为迫切的议事日程上来。但是，文学史学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问？它能否成立？有没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呢？这是我们展开这项研究时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顾名思义，文学史学当然是以“文学史”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然而，文学史又是什么呢？是那些标明为“某某文学史”的出版物呢，还是那些与文学有关的、确实曾经存在过的纷繁史实？

我们迎面就遇到了历史学界早就反复争论过的一个基本问题：我们研究的历史是什么？是真实存在过的客观史实，还是被写在书里的历史，即史述？随之而来的便是：真实客观的历史，原生态的历史或曰历史的原模原样在哪里呢？它不是早已消逝了吗？那在过

去时光里发生的一切,是否能够被今人所复原并真切地把握呢?我们今天了解历史,只能通过种种遗留物,通过历史书,可是,遗留物零碎不全,书写的历史又怎能与真实的历史等同?任何史家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前提假设和主观倾向,他所做的历史书写,能是客观、完整、真实、可靠的吗?

对于这些问题,哲学立场不同的学者,观点分歧很大。于是大致说来,便有历史绝对主义、历史相对主义乃至历史折衷主义等的区分。

当然,应该把客观历史与书写的历史加以区别,而不应混为一谈,这是学界如今比较一致的认识。著名史学家白寿彝晚年所撰《中国史学史》可以代表这个一般看法,其书开宗明义就引述李大钊(守常)《史学要论》,提出了这个区分。又引外国学者较早的言论曰:“史之一字其义有二:一为事迹之记,一为事迹之本身。”^①而在近年出版的英国 W. H. 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的译者序文中,有一段更明确的话:

伯里(J. B. Bury, 1861—1927)提出过,过去确实是什么样子,历史学就应该按那样子去写。不过,问题并不像伯里所设想的那那么简单。历史——即伯里所谓的过去确实是什么样子——并不单纯是历史材料或历史数据的函数,而且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是那些在研究怎样发现“过去确实是什么样子”的人们(也就是历史学家)的心灵和思想的函数。^②

没有一个史家不具备自己的世界观、立场、视野、知识结构乃至个性气质,这一切必定会影响他手中的笔,影响他所作的史述之面貌。同一段历史在不同史家笔下会被纳入不同的布局,给予侧重点不同的描述和评价,根本原因即在于此。一般历史如此,作为文化

史庞大体系中的一员的文学史,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事实上,文学史的情况还要复杂些。许多历史事件的发生与存在,是有其确切的时间和地点的,而在其发生之后,它就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即使因为时光流逝、大地变迁、世代递嬗,因为种种原因而使历史真相模糊不明或被遮蔽埋藏,那原本状态(亦即“过去确实是什么样子”)也大抵可以而且必须逐步把它考证和清理出来,尽可能地弄明白。一般历史是这样,文学史的许多情况当然也应如此。可是文学史的复杂性在于,尽管它的有些问题,如作家生卒宦历、作品出版年代之类,必须考证也有望考证清楚,但有些问题,却并不能靠考证来解决,是溢出于考证范围的。作品产生的时代与其生存的时代远不是一回事,作品的原生态和它的生存状态也不是一回事。《诗经》、楚辞、汉赋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流传至今,由于不断地被欣赏被解读,它们的生存史实际上已与传播和阐释密不可分,每一代人都会对前人的理解阐释有所继承和有所扬弃,每一代人又都这样那样地参与了对它们的解读和重新阐释,也就参与了对它们的再创造。我们读到的《诗经》,既保留着孔子删定的春秋时代各国各阶层及各种用途歌诗的痕迹,又已加上了齐鲁韩三家、大小毛公、郑玄直到王安石、朱熹和许多明清学者的理解和阐发,而现代的诗经研究者则又以新的社会、文学、宗教、伦理观念,甚或持西方文论、文化或人类学方法予以释读,不断从古老的文本中发现和发掘出新的意义,不断重新解释着《诗经》与其后中国历代文学的关系,也就不断重新安排着《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诗经》的生命并没有因它被写成文本而结束,它不但被记载在文学史中,也活在今天的文学流程中,而且将随着中华民族的存在而永远生存下去。《诗经》如此,楚辞汉赋唐诗等也莫不如此。这就是说,文学史既是已逝的往事,又是在逐渐不断生成着的现实,并将继续以活态的方式存在下去——文学史书写企图用文字凝固下来的,实际上乃是一种仍然鲜

活的文学现实,说起来也真是勉为其难,简直带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意味。换言之,今日所谓文学史也就只能是某个时代的人对以往文学(包括文学的过程和产品)的知识和认识而已。它的根基当然是真实的历史,但“某某文学史”,即写出来的文学史,却又绝不能和真实的历史划等号,文学史述只能是反映以往文学在特定时期生成(不是生存)状态的历史文本而已。真实客观的文学史与书写的文学史,显然是有区别的。

这样,我们也就可以说明文学史和文学史学的关系了。文学史的研究对象是真实客观的文学史事实,文学史家的工作是尽可能多地掌握文学史知识以不断地逼近文学史真实,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充当时代和人群的代表去努力表现对文学史的认识,并探索文学史的规律,在这个努力过程中写出“某某文学史”或其他有关论著,以此推动着文学史的形成和发展。而文学史学的注视对象并不是文学史本身,而是文学史家的工作,文学史学是要通过各种类型的文学史论著,即书写出来的文学史,展开对文学史研究的学理性考察,它是一种研究之研究,是对文学史研究活动和成品的反思和检验。

我们还可以思考得更深入具体一些。文学史,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去看,是有不同涵义的。比如,笔者在《文学史家的定位》一文中,曾因论述文学史规律的相对真理性而分析过文学史本体的相对与无限,提出过这样的观点:

文学史本体可以包括三个层次。首先,最具体的是文本,即可见的物化态文学;其次是由作品深入到人,到作家和一切人的心灵;最后是宏观地涵盖着一切文学现象、文学运动、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的文学氛围。这三个层次,呈由实到虚、由窄到宽之势,并且是层层深入的关系。^③

第三个层次还可分得更细一点。简略地说,文学史本体就包含着文本(以作品为主)、人本(以作家为中心)、思本(有关文学的思想

见解)和事本(有关文学的一切事情)等几个方面。这个概括是从文学史事实和大量文学史论著中提取的,同时也考虑了文学史研究更高的、比较理想的要求。文学史学当然可以而且应该从本体论角度来考察文学史研究究竟做得如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角度。

文学史学还可以从另一角度来看文学史的涵义,那就是把文学史看作是教学和科学研究的一种实践,文学史学是在这种实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学问。

从教育体系(主要是高等教育)的层面看,十分清楚,文学史是文科,主要是中文系的一门课程,也可以说是中国语言文学这个一级学科下几个二级学科(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乃至民族民间文学等)的总称。中国文学史的教学,一百年来积累了无数的经验教训,无论从教师还是从学生的角度,无论从课堂讲授还是教材编写的角度,都值得研究。而中国文学史讲义、教材的编写,又与文学研究相交叉。

若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体系的层面看,文学史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是文学研究中与理论研究(或所谓文艺学)相对的一种工作方式。而若从一般著述活动的角度看,文学史是著述编撰活动的一种形式,其成果往往就称为“某某文学史”,属于学术论著的一种类型,等等。这些方面自然也都是文学史学所极为关注的。

然而,文学史的意义远不止于此。文学史还是一种学术思路,一种学术能力,是观照、审察文学现象、作家作品时所达到的一种高度和视阈,并不是所有的文学研究、所有的文学研究工作者都能达到这种高度,都能掌握这种视阈。也就是说,并不是任何一种文学研究都可称之为文学史研究。因此,文学史又成为文学研究者的一种学术理念和标的,它意味着一种学术的规模、气象、境界和理想。这种种方面,都构成了文学史学的重要内涵,文学史学需要尽可能地抉发和高扬文学史研究的上述种种意义。